

张友渔回忆录

陈荷夫 编



京大学出版社

张友渔回忆录

陈荷夫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友渔回忆录

陈荷夫 编

责任编辑：陈 洁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5 印张 119 千字

1990 年 6 月第一版 199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301-01133-4/K · 085

定价：2.45 元

张友渔著作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陈荷夫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守和

马良春

王 迪

王云琨

刘兆兴

朱崇利

吴大英

陈荷夫

肖 平

段荣魁

高 德

赵蓉蓉

侯雨夫

程 文

鲁孝文



张 友 渔

前 言

自 1918 年起,张友渔就开始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为当时北京《世界日报》撰写文章,抨击时弊。1927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在跟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的岁月里,他以进步报人和教授的身份,口诛笔伐,又写了许多优秀文章,并以诗歌杂文为匕首向反动派攻击。七十年来,他的著作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全部作品估计近一千万言。

张友渔著作的编纂工作数年前即已开始。198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编辑出版《张友渔文集》。为了更好地进行准备,从 1985 年下半年起,就着手搜集散见于过去报纸杂志上的作品。由于年代久远,搜集工作是困难的。经各方面同志的大力协助,基本上得以找齐,并分门别类地加以抄印、整理和编纂。经过有关学者专家的努力,除核校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宪法论丛》一书外,另编出《法学论著》(吴大英、刘兆兴编)、《张友渔新闻学论文选》(王迪编)、《张友渔社论、通信、杂文选》(王迪编)、《日本问题和国际问题》(程文编)、《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风云》(朱崇利、高德编)、《政治学论著》(段荣魁、王云琨编)、《历史与现实》(丁守和、侯雨夫编)、《张友渔诗文集》(马良春编)、《张友渔回忆录》(陈荷夫编)等九个集子。这些学者在编辑张友渔著作时,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筛选其中至今仍有出版价值的作品。在搜集选编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张友渔著作编辑委员会

1988 年 2 月

目 录

毛主席、周总理教导我们做好统战工作

——回忆与吴晗同志共事时的一件往事	(1)
在少奇同志领导下工作	(7)
重读少奇同志著作的一些回忆	(17)
我在年轻的时候	(23)
中共北京临时市委的成立及被破坏的经过	(32)
有关华北救国会的一点回忆	(37)
天津“地下”三年	(42)
我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的片断回忆	(45)
我在抗战前对阎锡山工作的一段经历	(54)
中共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与山东抗战	(57)
抗战初期我在山东的活动	(63)
我党对石友三部队的统战工作概述	(71)
桂林的回忆	(86)
我所经历的营救工作	(92)
在董老直接领导下工作	
——回忆在重庆时期的几件事	(97)
回忆吴老及四川省委在重庆的斗争	(107)
革命文化运动的堡垒	(111)
怀念马骏同志	(116)
回忆与铃江言一的交往	(119)

地主阶级的叛逆者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回忆阮慕韩同志 (122)
- 张克侠同志在北平..... (126)
- 我所接触的李济深先生..... (128)
- 红色管家数此人
- 怀念熊瑾玎同志 (131)

毛主席、周总理教导我们做好统战工作

——回忆与吴晗同志共事时的一件往事

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向极为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他们不仅给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有关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还身体力行，亲自做统战工作，抓住典型事例，谆谆教导我们做好统战工作。

解放初期，我曾和吴晗同志在北京市人民政府一道工作。其间，曾发生过一件生活“小事”。事情虽“小”，却引起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亲自找我们谈过话，就如何认识并做好新时期的统战工作，做了许多宝贵的指示。这些谈话，虽说已经三十年了，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成立了北京市人民政府。从同年6月起，我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以后一直在北京市工作到1959年。1949年冬，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推选吴晗同志为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志当时是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他在民主革命时期与我们党合作得一直很好，表现进步。吴晗同志任职后，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从此我便和吴晗同志在一块工作。

我和吴晗同志初次见面，是在1946年暑假期间。当时他从昆明回北平，路经重庆，住在民盟四川省机关，我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去看他。他谈了昆明民主运动的情况和民盟的主要活动。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勇敢的民主战士，但还多少沾染一些恃才傲物的文人习气。1948年11月间，吴晗同志从北平到河北平山县党中央所在地城南庄（或西柏坡）见毛主席，谈过两次话。除谈政治问题外，还

谈了《朱元璋传》的问题。为此，毛主席还给他寄过一封信，信的原文是：

辰伯^①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谨致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介绍乔木同志来见，乞加指教。他是我这里的秘书，并管新华社工作。

我当时在华北局当秘书长，知道这件事，但未见到他。解放后，我从领导华北局城工部工作的刘仁同志那里，更多地了解到他的情况，所以当他到北京市工作时，我认为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他分分管文教卫生工作是适宜的，进步一定更快。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个看法没有错。

吴晗同志原任清华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委员，担任副市长后，仍兼任此职，住在清华大学宿舍，每天到市人民政府办公，一般是在机关午餐，同我和薛子正同志一道用饭。有一天，我和薛子正同志到市委去开会，没在市府吃午饭。薛子正同志回来后发现，行政人员给吴晗同志开饭时，减了菜。据了解，行政人员倒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因为吃饭的人少了，菜也应当少，就减了。吴晗同志对此虽没有任何表示，但我们却觉得这样做很不好，很容易使人发生误

^① 辰伯是吴晗的字。

解。我一方面找行政人员谈话，告诉他们以后不能再这样做；同时向彭真同志做了汇报。彭真同志很重视这件事，特别是联系到吴晗同志当时在市府和清华两处任职，工作很忙，并对政权工作不熟悉，曾提出回清华专门教书的事。认为这是关系统战工作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便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做了汇报。

当时就是这样，有了问题就汇报。无论同级之间还是上下级之间关系很融洽，很密切。下情容易上达，上情也就容易下达。有了问题，发现得快，解决得也快。

几天以后，毛主席通知我、刘仁、吴晗，下午三点到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住处谈话。我们按时去了，毛主席很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他问了吴晗同志的工作情况，问他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鼓励他大胆工作，安心工作。吴晗同志表示他一定努力工作，但深恐做不好，不如教书有把握。（这次谈话使吴晗同志深受感动，他决心在市政府工作，1951年，终于辞去了清华的兼职，搬进城来，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

接着，毛主席给我们讲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但着重谈的还是有关统一战线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更艰巨，更伟大。有了巩固的统一战线，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毛主席说，我们熟悉的许多东西，现在闲起来了。现有很多新的事物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学习去解决，没有知识是不行的。没有革命的分子们的共同努力，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的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是把党外民主人士当做自己的干部一样看待的。党员和党外民主人士共事，必须很好合作。有了问题，互相诚恳坦白地商量、研究、解决。在工作中，一定要使党外民主人士有职有权，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党外民主人士的作用。他问刘仁同志和我：“你们同吴晗同志的关系是不是这样？”我说：“我们做得不够。”

吴晗同志说：“我们的关系很好。”毛主席还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说，谁不要改造？都要改造。我自己还不是从孔孟之道，从康梁维新思想一步一步改造过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认为自己不需要改造，不对。认为自己还需要改造，就不敢工作，也不对。思想要改造，工作要大胆。有了错误不要怕，做工作还有没有错误的？最后，毛主席面向刘仁同志和我说：对党外民主人士进行统战工作，首先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但也要在生活上给以必要的关心和照顾。不做政治思想工作，只是吃吃喝喝，那是把统战工作庸俗化了。但只是板着面孔讲大道理，不解决实际生活问题也不行。

这天，主要是毛主席讲。从三点钟讲到五点多钟。毛主席留我们吃晚饭。三、四个菜，很简单，都是小盘，辣子很多。主食是一种比较硬的红米，里边搀些豆子。在吃饭时，我和刘仁同志都表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我说：“我和吴晗同志是对门而居，非公事不相往来。”毛主席当即反问了一句：“难道统战工作不是公事吗？”毛主席的这一反问，虽然语气温和，但给了我深刻的教育，我一直记住这句话。

就在那几天，周总理在国务院办公厅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周总理在讲整个工作中间，也讲到统战工作。讲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战工作的意义，讲了当前应当注意的问题，并举了我们这个例子。当时我正坐在总理面前第一排。总理说：“吴晗同志吃饭的事是怎么回事？你再讲一讲。”我就在会上又把这件事的过程讲了一遍，并做了检讨。总理继续讲，一定要重视做好党外民主人士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好，生活上也要照顾好，一定要使他们真正有职有权。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我们在全国人民中，总还是少数嘛！不同党外人士合作好，是不可能把革命和建设搞好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我们共产党不同，不能把要求共产党员做的，也要求党外人士做。并且，他们有自尊心，常怕被人瞧不起。减少一点菜，好象是小事，实际上，可能对统

战工作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必须教育行政人员，十分注意。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使我更加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了统战工作。

吴晗同志对工作抓得很紧，工作有不少成果，也取得了一些经验。这主要是吴晗同志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从来不能满足自己的进步，经常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1954年他给彭真同志写了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话：“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的啊忙乱。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

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用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的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为什么错，如何改正。

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

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目的没有甚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我希望在彭真同志有时间的时候，能够有一次谈话的机会。

.....”

吴晗同志的这封信，彭真同志批给了刘仁、我和薛子正同志，并指定我“切实设法解决其工作中的问题。”为此，我根据吴晗同志在信中提到的一些要求和意见，进一步地改进了我们对吴晗同志的帮助工作。吴晗同志在各方面也进步的更快。

由于吴晗同志为党、为人民、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不少工作，他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他终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原来，吴晗同志早在1949年1月，就曾寄信给毛主席要求入党。毛主席答复他说，同意他的要求，但实现时机尚值得研究。后来，他又几次提出要求。到1957年3月，中央正式批准吴晗同志入党，但作为秘密党员，不公开。

从此，我和吴晗同志的关系，在形式上，还是统战关系，在实际

上已经是党内的同志关系。本来吴晗同志可以多做些工作的,可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过早的去世了,这是很大的损失。

(《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在少奇同志领导下工作

“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刘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不白之冤以后，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一句简单而深刻的话，体现了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定的信念。林彪、“四人帮”对他的恶毒诬蔑，无损于他伟大的形象。

少奇同志曾长期在白区担负领导工作。他为党在白区培养了大批干部，对党在白区的工作有独特的建树。从少奇同志任党的北方局书记以来，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并曾多次亲自接受他对工作的安排和指示。正因为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被打成刘（少奇）、彭（真）黑线的人物。就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永远开除少奇同志的同时，把我也开始“监护”起来。其实，我同少奇同志的关系，完全是工作关系，没有任何私人来往。计算起来，最初在少奇同志领导下工作，已经过去四十多年时间。最后接受他对北京市工作的直接指示，也将近三十年了，但时间流逝，磨灭不了我对他的尊敬和怀念。

（一）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定派少奇同志到北方局来领导华北的抗日工作。1936年3月，少奇同志秘密来到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那个时候，我在太原，同徐冰、温健公做上层统战工作。同年夏天，我被调到北平，参加华北联络局工作。华北联络局是北方局的情报和统战机构，负责人是彭雪枫和王世英同志。和我直接联

系的是王世英同志，他住在天津，经常来往平津之间。我住在北平，是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的负责人。另一个小组成员是阮慕韩。王世英到北平后，就在我家开会，布置工作。我和少奇同志没有直接接触。少奇同志的指示，由王世英同志传达给我。同时，我还经常从当时我们党办的半公开刊物《火线》上，阅读少奇同志以 K. V 和陶尚行等笔名发表的有关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论文，作为进行工作的指针。少奇同志以高超的领导艺术，率领着党在白区的大批党员，为正确地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广大群众进行不懈的斗争。少奇同志在长期的白区工作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关于白区工作的指导思想，概括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个字。我长期在白区工作，党组织就是根据这个方针，一直对我的党员身份严格保密，让我以左派文化人的面貌出现，进行革命活动。来到华北联络局工作，仍然是这样。我的公开职业是大学教授，政治面貌是华北救国会的领导成员。华北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是许德珩、张申府。直接归北方局领导的秘密党员杨秀峰也是华北救国会领导人之一。另外的领导成员还有黄松龄、程希孟。华北救国会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除了通过我们外，少奇同志还派北方局成员彭真同志来参加过华北救国会领导人的会议。记得彭真同志第一次来华北救国会时，约好的地点是在张申府家。我原来以为这是头一回见到彭真同志，不料出现在张申府家里的一个穿蓝灰大褂的同志，一见到我就笑着打招呼：“张友渔！我是傅懋公。”我才恍然大悟，彭真同志原来是“五四”时期在太原搞马列主义小组的太原第一中学的学生。那时我是第一师范的学生，我们一道参加过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天津搞地下党时，也有过工作关系，但没有晤面。彭真同志代表北方局和少奇同志阐述当前形势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并对华北救国会的工作有所指示。可是华北救国会里的一般成员及那些和华北救国会频繁接触的人士，也并不知道少奇同志通过华北救国会核心里的

秘密党员开展革命工作。

当时，“左”倾路线的残余在华北还很有影响。在学生运动中有脱离群众的倾向。1936年3月底，北平学生举行了一次抬棺游行。棺材里装的是一个被国民党杀害的河北高中的学生，名叫郭清，是我的表侄。这次游行脱离了广大群众的觉悟水平，遭到反动派的沉重打击。对社会上层人物和国民党军队方面，也有关门主义的倾向。少奇同志担任北方局书记后的第二个月，即1936年4月，就写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在《火线》上发表，对党在白区的工作起了极其有力的指导作用。华北的抗日运动，在北方局及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迅速克服了脱离群众的“左”倾偏向，广泛团结群众，并开始联系各阶层的爱国分子，争取爱国军人，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王世英同志传达北方局、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要我在上层军政界及文化界开展活动。在军政界，要我一方面积极协助党中央派来作宋哲元工作的秘密代表张经武同志，一方面自己也要积极去作宋哲元的工作，推动他抗日。宋哲元本来是冯玉祥西北军系统的重要将领，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同蒋介石有矛盾。做好对他的统战工作，对推动在华北的军政力量投入抗日有重大作用。宋哲元下边有三种势力：一是亲蒋介石的，如北平市长秦德纯；二是亲日本的，如天津市长萧振瀛；三是主张和我们合作的，如政务委员会高级参议刘治洲和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等。我以华北救国会领导成员的身份，通过刘治洲、张克侠同宋哲元接触。我曾在张克侠主办的二十九军参谋训练班讲课，课程是《日本问题》，内容是宣传抗日的。这项工作，主要是根据北方局传达下来的党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去做的。要看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本来就同蒋介石有矛盾的宋哲元有参加抗战的可能。一方面向他揭露蒋介石的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和行动，另方面向他指